

# 近代甘肃工商业发展的困境浅析

吴晓军 张希君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近代甘肃经济社会落后与工商业不发达有密切的关系。分析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甘肃工商业发展的内外条件十分不利,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各方面所遭遇的发展困境具体表现:缺乏人才、技术和市场;战乱给工商业的生存发展造成极大破坏;政治的腐败与各种苛捐杂税使企业难以生存;省内度量衡不统一;兵匪横行;国外商品的冲击;自然灾害也产生了明显的束缚作用。

【关键词】甘肃工商业 发展条件 战乱 苛捐杂税 度量衡

中图分类号 F7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0)07-0118-04

近代甘肃工商业的发展十分曲折艰难,有限的工商企业经营规模狭小,经济效益欠佳,尤其是工矿企业难以持续和充分发展,造成甘肃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牢固僵化,严重滞缓了甘肃城镇化速度,影响到甘肃近代化的水平。阻碍甘肃工商业发展的原因,既有社会经济方面的,也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共同构成阻碍其发展的一道道屏障,本文就这一问题做以分析,以期有所借鉴。

## 一、甘肃工商企业发展缺乏基本的生存环境

近代甘肃工商企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十分恶劣。一是近代甘肃生态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低,购买力不强,市场发育程度低,影响到工商业的兴盛与繁荣。二是交通落后,工矿企业生产经营受到官府过多干预,由此带来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和效益的下降。三是工矿企业的投资以官僚资本为主,而官僚资本不强,私营资本太弱,必然造成企业发展规模小,人才匮乏,技术与管理落后,产品质次价高,缺乏竞争力和支撑力,成为企业经营中无法破解的难题。

以上不利因素对工矿企业的经营与生产影响尤为突出。甘肃工业奠基于19世纪80年代左宗棠创办近代企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上述状况始终没有大的改观。以抗战期间军政部的毛织厂为例,该厂的前身是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呢局。初建该厂,左宗棠抱有极大的希望,想通过该厂改善甘肃人民的衣着问题。然而该厂创办后的数十年中,“其制毡纺毛制呢诸部,惜以时开时停,类多腐朽”。直到抗战期间,仍然使用旧的蒸汽锅炉,因为太陈旧,不敢烧大压力。所以遇上水时,即降低压力,不能开车。建厂之初还配套

建有翻沙厂、修理厂,几十年后,“均残缺不堪用”<sup>[1](P12-13)]</sup>。

甘肃机器厂由清末新政期间兴办的甘肃制造局发展而来。后来的经营也是时停时产,发展十分坎坷。抗战期间该厂更名为甘肃机器厂,所用技术员以原设于山西的西北实业公司之人为多,至于技工几乎都是山西兵工厂和西北实业公司的工人<sup>[1](P14)]</sup>。这与抗战期间东部大批企业、职工西迁有关。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甘肃人才资源的匮乏与技术力量的薄弱。从长远而言,更加剧了甘肃人才的流失。如抗战胜利后,大批技术人才东归,使企业再一次陷于被动的境地。

矿产冶金则更加落后。甘肃的省会兰州及周边地区,“在近代是西北工业中心,但冶铁业仍未走出风箱、土炉的局限”。“铁矿采冶亦始终未能脱离手工操作,与东南一带自洋务运动以来已经开始发展的近代钢铁工业相比自难望其项背”。甘肃盛产黄金,而金矿生产几乎全为手工淘采。河陇各矿,特别是岩金、银、铜及铁矿,由于技术设备落后。塌洞事故屡有发生,一遇水灾、火灾、震灾,更是束手无策,唯坐待人亡矿闭。冶金矿业缺乏技术人才,也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近代中前期工矿业中的技术人员几乎全为本省人士,但他们仅知原始土法采冶。这种情况一直到抗战期间,才有所改善,少量先进技术和人才从东部来到西北,但在西北特定的环境下亦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sup>[2]</sup>。

甘肃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让城镇及工商业的发展倍受限制。甘肃水泥厂设在窑街,是因为当地有石灰石、石膏、煤等资源。此后发展却受到自然环境的严重制约。建厂时设想利用黄河上游河道运输产品,即“运货有皮筏可得利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甘肃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04XZS007)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吴晓军,男,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教授,研究方向为西北生态环境史、西北社会史;张希君,女,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用”<sup>[1](P12)</sup> 实际这种运输方式只能供应黄河一线的个别地方。

对于甘肃工矿企业发展中遭遇到的种种问题,时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的张心一,就有深刻的认识。针对抗战期间甘肃工业状况他讲到:一是机器设备因抗战期间交通不便,不能得到合乎理想的东西,所以,工作效率根本太差。二是这些工厂多半是与中央政府合办的,事务、会计等手续繁杂,不能不用许多不生产的人员,所以间接成本太大。三是物价涨的很快,资金来的很慢,所以,不能把握预算,资金周转不灵,借款利息又大,又增加了许多消耗。四是西北人口很少,购买力不大,消费极小,轻工业本不发达,工厂出品稍多一点,就发生生产过剩的现象。其实并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消费不足。五是许多厂非停工不可,与主持人员的复员大有关系。中国的人才根本不够用,中央调去这些技术人员,也是不得已。可是甘肃吃大亏。我们前几年再三叮咛,请这些技术人员,每人培养提拔几个本省人,传授他们的技能,到他们离开甘肃的时候,这些人继承他们的工作,但大多没有办到<sup>[3](P6-7)</sup>。

## 二、战乱对城市及工商业产生严重的破坏

城镇是聚集工商业的平台,而近代战争对城镇建设的破坏及城市经济的繁荣影响巨大。近代中国战争频繁,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东南沿海地区饱受外国列强的入侵。特别是八年抗战,东南大部分地区沦陷,城镇饱受战乱之苦。另外太平天国起义、北伐战争、国共十年内争和解放战争等国内战争,也使得全国许多城镇历经战火的洗礼。

甘肃地处西北,在上述战争中,基本上不处于战争的中心区域,城镇工商企业和全省人民本应该幸免于战火的蹂躏。实际上,近代甘肃却长期陷于地方上的大小战争之中,使人民群众一遍又一遍遭受战乱之苦,一座又一座城镇在战火中化为废墟。

近代对甘肃造成较大影响的战争有几次:同治陕甘回民起义、白朗入甘、马仲英反抗国民军,还有省内各地发生的其他战事。同治回民起义,本来是回族群众反抗清王朝暴政的一起人民起义,由于一开始统治者处理事件的态度及方法的错误,致使事件逐渐演变成波及西北的民族之间的仇杀,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古浪县在1863年(同治2年)“大靖堡民团一夜袭击城内回民,城外回民东走宁夏金积堡,南走大通、西宁等地。”陕西回民反清,首领杨文治占领裴家营,与官兵、民团激战,从此陷于战乱之中。直到1873年(同治12年)左宗棠的湘军进入古浪,回民军才西逃,前后长达10年之久。期间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商业与城乡经济元气大伤。如1866年(同治5年),回民军攻打古浪县城,虽然没有破城,但掠关厢商民而去<sup>[4]</sup>。永昌境内的水磨关,在河西大黄山(焉支山)下,历史上是番汉互市之所,十分繁荣,因遭同治回变,“坍塌不复成形”。<sup>[5](P172)</sup>同年11月,西宁回民起义军进入河西,攻克抚彝县城(现临泽蓼泉),虏掠县境各堡寨<sup>[6]</sup>。1865年(同治4年)2月,肃州境内回民焚烧嘉峪关城,由肃州东关杀入大城,攻陷肃州。城破之时,花子、流民、匪徒等“前驱杀人,跟后放火”<sup>[7](P407-408)</sup>,使人民残遭荼毒。回民起义“对金

属矿业的打击最为严重。河陇地区矿厂较新疆受害更大,矿夫或被杀或逃亡,诸矿几乎全部停顿。由于社会缺少必要的安定,与战乱并生的抢劫亦对劫后余生的矿厂为祸甚烈”<sup>[8]</sup>。

民国以后甘肃战乱更加频繁。国民军进驻甘肃期间,曾发生了地方军阀黄得贵、宋有才、韩有禄、张兆钾、孔繁锦等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军的战事,黄得贵部从阿干镇偷袭兰州,他们的战斗誓词是:努力打进了兰州城,每人赏一个好老婆,再给一盏上等大烟灯”<sup>[9]</sup>。由此可以看出军阀部队祸害人民的本质。

1928年,为反抗国民军的民族歧视政策和苛捐杂税剥削,马仲英发动了河州事变。随着战争的发展,由于国民军处置方式不当,再加上部分起事者自身素质的影响,使这场原本以回族群众为主,各民族共同参加的人民起义也蜕变成了一场民族间的仇杀。他们进入河西地区,先后在武威、永昌、镇番(民勤)等地屠城。特别是攻占镇番(民勤)后,在城内杀人放火,全城不满一万人,竟被屠杀了4600多人<sup>[10]</sup>。山丹县自清末以来,形成了由尤氏家庭经营的德盛成、万兴成等大商号,尤家也成为富甲全县的首户。1929年正月,马仲英占据山丹后纵兵抢掠,万兴成的东家尤国武被捕去。军队为索要藏银对他吊拷烧烫,最终惨遭杀害。受此打击,德盛成与万兴成一蹶不振,随即停业<sup>[11]</sup>。河西西部的酒泉“乃中外咽喉,河西大镇”<sup>[7](P407)</sup>,历来商业发达。1931年冬,马仲英率兵第二次进驻酒泉,他为了扩充实力,抓兵无休止,征派捐款、到处借款更是难以应对。造成当地和义成、永顺和、春茂合、晋生太、晋生祥、万兴魁、大义长、德兴源、四箴明、广义垣、庆余当、万盛成、成盛昌、同巨生、同巨和等20余家一、二等商号到闭。大商号倒了,一切摊派自然而然地落在小商号和摊贩头上。以往小摊贩不派捐款,现在也要承担各种派款和差役。军队征收草料不付钱,还多交少计,迫使小摊贩无法经营,最终一跑了之,工商业者叫苦连天<sup>[12]</sup>。再如1929年5月17日,敦煌驻军连长张国民率部哗变,虽然在城内没有杀伤一人,却在事变当夜大掠城关,大小商家损失约10万元。<sup>[13](P16-17)</sup>

## 三、恶政与苛捐杂税使工商业生存艰难

近代甘肃政治黑暗是社会的一大特点。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更加显著。政治黑暗的背景在于中央权威衰微。国家名义上是统一的,但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军阀力量的兴起,并在地方上坐大,广泛地干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成为政治黑暗的主要祸根。

近代甘肃自然环境的恶劣,更放大了黑暗政治的社会影响。甘肃是一个偏居西北内陆的贫困省份,地方军阀官僚为所欲为,中央政府却鞭长莫及。许多由内地来甘任职的官员到甘肃的目的,并不是为人民谋取福祉,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的私利。甘肃人民在近代为生存和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工商业发展的艰辛,并不为世人所知。20世纪30、40年代一些人到甘肃考察、探险,对此深感震惊。

北洋政府统治甘肃期间,任命陆洪涛为甘肃督军兼省长。陆的号令不出兰州,全省分别在八个镇守使的割据之下。<sup>[14]</sup>在经济上他们随意设税目和摊派,还利用权力垄断工商业的经营权,甚至铸造劣币钱,滥发钞票,扰乱了市场秩

序,束缚民族工商业的发展。<sup>[15]</sup>冯玉祥的国民军入甘后,视甘肃为提供兵源、饷源的大后方,“在财政上,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负担之重,超过过去十倍以上。特别在征兵上强拉硬征,致使老弱沦于沟壑,青壮散之四方,生产停顿,十室九空。”<sup>[16]</sup>刘文海在《西行见闻记》中记叙,其父兄在酒泉经商,兼营驼运。但在1928年所有的骆驼都被国民军“拉差”到省会皋兰(兰州)。刘文海根据切身经历斥之:“拉差即等于没收”,完成了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手续。<sup>[13][18]</sup>这样的明抢豪夺在国民军统治甘肃期间司空见惯。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后国民军退出甘肃,权力真空导致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再度称雄割据,如陈珪璋盘踞陇东,马廷贤部盘踞陇南,鲁大昌部盘踞洮岷,黄得贵部盘踞固原、隆德,王志元部盘踞靖远,马步青和马步芳部韩起功等盘踞河西,原国民军残部雷中田、高振邦等控制兰州及其附近的地方。各地军阀为争夺地盘和利益,相互争斗,就地摊粮派款,工商经营者自然就成为他们搜括的主要对象<sup>[17]</sup>。

恶政必然产生苛捐重税的压榨,引发通货膨胀,导致工商业萧条。1908年马达汉在秦州(天水)考察,看到当地以前“商业活动十分繁忙,可能比甘南任何一个地区更繁忙”。近几年商业却已经衰落。根源在于“三年前提高了厘金,厘金几乎提高了50%,同时,鸦片税规定缴纳过去的10倍。今年还准备增加厘金税”。“现在大商行的数量只及过去的一半”<sup>[18]</sup>。民国年间甘川两省交界一带,甘肃各种税收明显高于四川。岷江为川甘交通大道,范长江从四川入甘,就发现这一问题。“所过二三百家之大集镇甚多,除宕昌外,难寻得一较为完备之饭店”。在无战争的和平状态下,“来往商贾,寥若晨星”。范长江讥讽为“特税(百货厘金)之功,当在不小”。<sup>[19]</sup>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不顾全国人民的利益发动内战,结果造成通货膨胀无法抑止,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给工商业的发展带来致命打击。据1949年5月临泽县沙河乡百货业同业公会报告,该会注册商号16家,多系1948年开业。此时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对人民的掠夺也几近疯狂。这些商号因物价飞涨,“赔累不暇”,不久就有10家歇业。到年底,全县商号仅存数家<sup>[20]</sup>。

过度的税收还表现在关税上。1929年酒泉市面萧条原因之一在于在嘉峪关所征的“洋关税”。这是因十数年前,“有酒泉某当道借口提倡教育,巧立此颂名目征收,西北商人大都不明洋关税真相,故不反抗。更可异者,则为彼税吏一味剥削,不论某项为洋货,某项为土产,如新疆出之缠头布及包仁杏干,皆作洋货纳税。结果,不外阻塞商货流通,增加小民负担。”滥征税,不但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还力口重了人民的贫困。如购买缠头布者,“皆为甘肃贫苦阶级,无力购服,只得赤身露体也。”征税名为用于教育,实则多被地方官吏私吞,故刘文海提出:“此项例外收入,是否用于教育范围,亦殊为一大疑问云”<sup>[13][16]</sup>。

#### 四、度量衡不统一严重制约工商业的发展

在近代化的背景下,工商业发展必然要求统一度量衡,进而统一市场。甘肃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狭小的地方市场独立存在,境内使用的度量衡器,大小悬殊,极不一致,严重地妨碍了各地的商品交换和流通,制约

了市场的发育,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如甘肃的度器,就有裁尺、工尺、营造尺之分,衡器则有单称、双称、加一、加二、加三等名目,且有以16两为一斤者,有以24两为一斤者,还有以32两为一斤者。量器有仓斗、市斗之别,仓斗为公家出纳仓粮之斗,市斗为一般市面交易所用之斗。市斗多以筒计,清末民初筒的大小不一。在平凉、天水一带,以24筒为一斗,永登则以36筒为一斗,皋兰则以72筒为一斗。在皋兰县的甘草镇、武山县的洛门镇,又以84筒为一斗,这种现象长期延续,可谓混乱至极。冯玉祥国民军进入甘肃,面对这一情况带来的不便,决定整理全省度量衡。1927年,由省建设厅拟定具体整理的办法,呈送省政府下令批准施行,并制造标准衡器二千余杆,准备发行全省通用。这一行动,无疑对推动甘肃商业经营的近代化与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积极意义。然而,正在这时,国民党政府工商部宣布采取万国公制,并颁发了“中华民国国定方案”,其规定的标准与甘肃省所制定者有所不同,故甘肃省政府制造的标准衡器遂中止发行,“拟待国民政府颁发的标准器到甘肃后,再统一进行”。结果一直拖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甘肃的度量衡仍未实现统一,依然处于“采用互异”的混乱状态中<sup>[21]</sup>。

#### 五、其他因素对工商业的束缚

除以上因素,工商业的发展还受到以下影响。第一,工商业往往是土匪抢劫、绑票对象。近代社会治安混乱,土匪祸害之事时有发生,商号聚集一定的财富经常受到他们的侵害。为了保护商户及其财产的安全,有些地方的商会负责集资买枪,组织起商团,这又增加了经营的成本。1918年庆阳县由商会领导发起成立商团,商户各出一人为团丁,服从商会的管理和调遣。大商人外出经商,多为马骠结队同行,兼有商团武装护送。<sup>[22]</sup>匪患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近代始终没有解决。第二,甘肃工商业发展受到外国工矿产品的强烈的冲击,本地产品无论在品质、价格上都无法与外国商品竞争。所以随着中国半殖民地程度的加深,省内工矿企业的生存处境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第三,自然灾害的影响。近代甘肃自然灾害频发,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对城镇及工商业的影响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地震。近代发生在甘肃境内的几次大地震几乎都带有毁灭性。如固原和海原大地震、古浪大地震等。固原海原大地震后的多年后,有人路过静宁,仍记载当地“虽素称富饶,然受影响甚巨,迄今尚未恢复原状”。“自平凉而西,多罹震灾,城垣崩塌,房屋坍塌者,触目皆是。”<sup>[15][37]</sup>这一方面说明地震惨烈和破坏之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甘肃城镇自身恢复重建能力十分低下的事实。

企业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城镇发展的基础。近代化的最本质的内容,就是构建以近代工业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系。以上分析,基本揭示了近代甘肃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

#### 参考文献:

- [1]李烛尘.西北历程[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 [2]朱立芸.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筋论[J].开发研究,2005(5).
- [3]张心一.六年来甘肃生产建设[A].甘肃(下转第123页)



趋势。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袁世凯在军队组建方式中都主张采用招募制；同时由于各地新军都是由各自省市自行筹款供养，毕业后要调回本省军队中担任职务，这样也就造成了军队中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和排外性。在这种军队组建思想和体制影响下，自然形成了一种以恩师、亲朋、同乡、同学为纽带的关系网，例如当时的北洋军人大多是袁世凯的羽翼。当时的军事教育中，向士兵灌输的是一种“衣食父母”的思想，强调将大都督奉为父母，事事处处都要以大都督为中心<sup>[7]</sup>。在这种军事教育和思想的灌输下，形成了部下对上只知道服从，从来不敢自做主张，又加之具有‘报恩’思想这种私人情感在内<sup>[8]</sup>，所以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服从。这种军事教育的畸形发展，直接导致的就是私人军事集团的形成。北洋军队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通过北洋军队的这种私人军事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清末创办的一系列军事学堂和开展的一系列军事教育对中国军事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其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各军事集团编练军队和兴办各类军事学堂，最终通过一种裙带关系导致了军队的私有化，直接造成了辛亥革命中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和困苦。

- (上接第 120 页)文史资料选辑(第 26 辑)[C].
- [4]古浪县志[M].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17、877.
- [5]林鹏侠.西北行[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 [6]创修临泽县志[M].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
- [7]高台县志辑校[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 [8]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 [9]宣侠父.西北远征记[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 [10]王新潮.马仲英屠民勤[A].引十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C].
- [11]郭兴圣.清末及民国时山丹商业的兴衰[A].山丹文史资料(第 3 辑)第 35 页.
- [12]王志祥.马什英在酒泉[A].酒泉文史资料(第 2 辑)第 83 页.
- [13]刘文海.西行见闻记[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 [14]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07 页.这八个镇守使分别是:宁夏镇守使马鸿宾,驻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凉州镇守使马廷勳,驻凉州(今武威市凉州区);甘州镇守使马磷,驻甘州(今张掖

可见,晚清西方军事教育在中国的传输为晚清培养了大批近代军事建设专门人才,推进了中国军事教育内容与体制的近代化,促成了建立了一支保卫海防的新式海军的建立,同时促进了民族爱国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但由于传输过程中的滞后性与机械性造成弊端和障碍并存,导致私人军事集团的形成。晚清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就是在这种弊端和障碍中艰难前行着。

参考文献:

- [1][美国]鲍威尔.1895-1912 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M].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 [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M].
- [3]清实录.德宗[M].
- [4]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 [5]李鸿章.论武弁在德国学艺情形.续选出洋学生折.
- [6]袁世凯.袁世凯奏议下册.
- [7]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刊印,第 4 卷.
- [8]赵治国.士兵选练与北洋新军近代化[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1(5).

- 市甘州区);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驻西宁;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驻天水;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驻平凉;肃州镇守使吴桐仁,驻肃州(今酒泉市肃州区);河州镇守使裴建准、驻河州(今临夏市).
- [15]参见宋仲福,邓慧君.甘肃通史·中华民国卷[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36~37.
- [16]马廷秀.“雷马事变”扣押马鸿宾侧记[A].宁夏文史资料(第 14 辑)第 41 页.
- [17]杨子恒.陕军孙蔚如部入甘始末[A].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第 109 页.
- [18]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M].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498.
- [19]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新华出版社,1980:41.
- [20]临泽县志[M].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206.
- [21]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261.
- [22]庆阳县工商贸易及丁商业联合会简史[A].阳县文史资料(第 1 辑)第 282 页.